# 世界投资报告 2018

投资与新工业政策



# 世界投资报告

投资与新工业政策

要旨和概述



联合国2018年,纽约和日内瓦

# 说明

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投资和企业发展问题的协调中心。作为全球卓越中心,本司开展前沿研究和政策分析,向 160 个成员国和区域集团提供技术援助,并在贸发会议 196 个成员国中建立国际共识。其使命是为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推动投资和企业。

本司提供:

#### 两份旗舰产品:

《世界投资报告》世界投资论坛

#### 六项关键政策框架:

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 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行动计划 创业政策框架 国际投资制度改革一揽子方案 投资便利化全球行动菜单 会计发展工具

#### 七项核心服务:

投资数据库和研究 国家和国际投资政策 投资促进 负责任的投资 工商便利化 创业发展 会计和报告

关于这些产品、框架和服务以及本司出版物的资料可在贸发会议网站 (www.unctad.org/diae) 或贸发会议投资政策服务站 (www.investmentpolicy hub.unctad.org) 上免费获取。

本出版物所载材料的版权归贸发会议所有。材料可自由引用或转载,但请注明出处,并提及贸发会议和本报告。应将一份引用或转载了此种材料的出版物寄送贸发会议秘书处(电子邮件: diaeinfo@unctad.org)。

本概述是根据《2018年世界投资报告:投资与新工业政策》(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C.18.II.D.4)中所作的深入分析编写的。

UNCTAD/WIR/2018 (Overview)

版权©联合国, 2018年 版权所有 联合国印刷, 日内瓦

# 前言

201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减少了23%。发达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跨境投资大幅缩减,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则接近于零。预计2018年的复苏将非常有限,因此这种负面趋势成为全球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长期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因为在这些国家,国际投资对于可持续工业发展而言不可或缺。

这种令人不安的全球投资局面突显了必须创造以开放、透明和非歧视性投资政策为特点的有利的全球投资环境。本报告的主题章表明,近几年有100多个国家通过了工业发展战略。针对与新工业革命相关的机遇和挑战,出现了新的工业政策类型。本报告为这种新环境下的投资政策工具提供了一些备选方案。

我认为今年的《世界投资报告》对国际投资和发展界的 一项重要辩论作出了及时的贡献,特此推荐。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 序言

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推动这场革命的是前沿技术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它们前所未有地提升了生产的质量和速度,同时降低了成本。这场新的工业革命为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具有难以想象的潜在利益。新技术预示着产业升级和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运输和通信成本降低,再加上更高效的物流,也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一些最先进的新兴经济体已经即将成为若干行业的全球技术领军者。

但是,新经济时代和技术创新不断加速的步伐也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动荡,并加剧不平等。例如,现有的投资模式可能在资金流动和内容方面经历深远的变化。去年的《世界投资报告》凸显了数字经济对外国直接投资逐渐显现的结构性影响。

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面临重大挑战。这些挑战从结构性制约因素(如缺乏充足的基础设施和资金来源不足)到战略问题,不一而足。在一个制造业日益自动化的世界里,离岸外包和转移至提供更廉价本地劳动力的目的地变得意义不大。与此同时,改善生活条件需要创造就业,而就业依然严重依赖制造业。市场小的发展中国家在投资政策上面临额外压力,因为公司越来越多地寻求能够提供最佳条件以便快速、贴近客户并通过灵活的生产流程交付优质新产品的投资地点。

非洲面临的挑战特别突出。尽管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强劲经济增长,但非洲的经济转型水平一直较低。制造业在非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很小,并在过去十年中进一步下滑或停滞。但制造业有可能在正规部门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从而提高生活条件。

面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格局和深刻的结构调整,近年来,全球各国政府 纷纷加强工业政策的力度。一种日益增长的共识是,结构转型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需要积极主动的政策,促进向生产率更高、附加值更高的新部 门和新活动过渡,同时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

在追求多重目标的同时,新的工业政策变得更加复杂和相互交织,运用了 从贸易到教育的多种手段。这些工业政策的核心是外国投资。投资能够 实现产业建设和升级。投资与国际市场接轨。投资还能推动重要的创新, 提高竞争力。总而言之,目前的辩论内容不再是政府是否应该干预,而是 如何干预。

工业政策以及作为辅助的投资政策需要以一个明确阐述的愿景为核心,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必须包含切实和详细的建议、明确的行动时间表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责任分工。

在这种背景下,《2018年世界投资报告》旨在为新工业政策与投资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一种更好的理解。报告概述了各种工业政策模式——基于100多个国家在过去十年中通过的工业政策清单——以及投资政策在每种模式中的作用。报告说明了投资政策工具如何在各种模式中得到不同的使用,并提出了通过更有效和更高效的投资政策来加强工业政策影响的方法。最后,报告提出了更新现有投资政策工具(包括投资激励措施、经济特区、投资便利化和外国投资筛选机制)的建议。

在这份报告的基础上,贸发会议将在 2018 年 10 月 22 日至 26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六届世界投资论坛上主持一场关于工业政策和投资政策间交叉区域的讨论。

让我们共同努力寻找解决办法,确保经济变革不会制造新的困难,而是带 来广泛分享的惠益,并为所有人实现更美好的生活。

贸发会议秘书长

Xrughisx Mutuyr

穆希萨•基图伊

# 鸣谢

《2018 年世界投资报告》由 James X. Zhan ( 詹晓宁 ) 领导的小组编写。小组 成 员 有 Richard Bolwijn、Bruno Casella、Hamed El Kady、Kumi Endo、Thomas van Giffen、Kálmán Kalotay、Joachim Karl、Hee Jae Kim、Isya Kresnadi、Guoyong Liang ( 梁 国 勇 )、Anthony Miller、Shin Ohinata、Diana Rosert、William Speller、Astrit Sulstarova、Claudia Trentini、Elisabeth Tuerk、Joerg Weber 和 Kee Hwee Wee。

Jorun Baumgartner、Juan Carlos Castillo、Tiffany Grabski、Josse Jakobsen、Kim Kampel、Melinda Kuritzky、Sergey Ripinsky、Stella Sakellaridou、Stefanie Schacherer、Sylvie Somerville、Ilan Strauss、Paul Wessendorp 和Linli Yu (于林立)提供了研究支持和投入。Marta Kolasinska、Ventzislav Kotetzov、Oktawian Kuc、Mathabo Le Roux、Eduardo Lins、Abraham Negash和 Michelle Ngo 也作出了贡献。

Bradley Boicourt、Mohamed Chiraz Baly 和 Lizanne Martinez 提供了统计协助。

Caroline Lambert 协助编辑了手稿,Lise Lingo 编辑了清稿。Pablo Cortizo 负责图标、地图以及信息图的涉及,并和 Laurence Duchemin 共同负责了报告的排版。Elisabeth Anodeau-Mareschal、Nathalie Eulaerts、Rosalina Goyena、Jovan Licina、Siyanla Sikounnavong 和 Katia Vieu 为报告的印制提供了支持。

Harsha Singh 为报告第四章提出了大量建议。在编写报告的不同阶段,特别是为讨论草稿而举行专家会议期间,编写小组得益于以下专家的意见和投入: Willy Alfaro、Azar Aliyev、Antonio Andreoni、Nathalie Bernasconi、Sjoerd Beugelsdijk、Jonathan Bonnitcha、Damien Charlotin、Manjiao Chi、Xiaolan Fu、Angel Gonzalez-Sanz、Nicolas Jansen Calamita、John Kline、Markus Krajewski、Sarianna Lundan、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Ted Moran、Rajneesh Narula、Anthea Roberts、Mavluda Sattorova、Esme Shirlow、Jagjit Singh Srai、Heinz Tüselmann、Gus Van Harten、Markus Wagner 和 Philip Wooldridge。

还要感谢贸发会议其他各司作为内部同行审议进程的一部分提出了评论, 秘书长办公室也提出了评论。联合国制图科在区域地图方面提供了咨询 意见。

一些中央银行、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许多工作人员也为报告作出了贡献。

# 目录

前言				٠.	٠.		 		 		٠					. ii
序言							 		 							. i۷
鸣谢	·						 		 							. V
要旨	·						 		 							Vİİ
刍	全球趋势	和前身	圭				 		 							. 1
	区域趋势						 		 							11
ż	设资政策	趋势。					 		 							16
扌	设资与新	工业政	女策.				 		 							23

# 要旨

## 投资趋势和前景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减少了 23%,降至 1.43 万亿美元。这与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的加速增长形成了鲜明反差。减少的部分原因是跨国并购值减少了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23% 2017 1.43 万亿美元

22%。但即便不考虑导致 2016 年外国直接投资激增的一次性大型交易和企业重组,2017 年的降幅依然很大。作为未来趋势指标的已宣布的绿地项目投资值也减少了 14%。

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 2016 年 10% 的降幅之后 没有出现复苏迹象,稳定在 6,710 亿美元。

- 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继续下滑,较2016年减少21%,降至420亿美元。下降集中出现在大型初级商品出口国。
- 进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流量保持稳定,为4,760亿美元。该地区重新成为世界上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
- 流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外国直接投资受该地区经济复苏的提振,增加了8%,增至1,510亿美元。这是六年来的首次增长,但流入量仍远远低于2011年初级商品繁荣时期的峰值。
- 对结构薄弱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仍然乏力。进入最不发达国家的流量减少了17%,降至260亿美元。进入内陆发展中国家的流量小幅增加了3%,达230亿美元。进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流量增加了4%,达41亿美元。

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减少,降幅达 37%,降至 7120 亿美元。由于造成 2016 年投资模式的大规模交易和企业重组减少,跨境并购出现 29% 的降幅。流量的大幅缩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联合王国和美国在经历 2016 年的峰值后回到了先前的水平上。

#### 外国直接投资下行趋势



流入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 27%,降至 470 亿美元,为 2005 年以来第二低的水平。下降反映了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对 自然资源的投资停滞。

对 2018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预测显示增长乏力。预计全球流量将略有增长,最多可达 10%,但仍将低于过去 10 年的平均水平。从通常情况看,对经济增长、贸易额和商品价格的较高的预测意味着 2018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出现较大的增幅。但是,风险显著,政策不确定性大量存在。贸易紧张局势的升级和扩大可能对全球价值链的投资产生不利影响。此外,美国的税务改革以及税率竞争的加剧可能对全球投资模式产生重大影响。

收益率的下降是造成投资下滑的一个因素。目前全球外国投资的平均收益为6.7%,低于2012年时的8.1%。所有区域的投资收益都在下降,其中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降幅最大。外国资产收益的降低可能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长期前景。

所有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都有所减少。初级部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并购值都出现下降。2017年宣布的绿地项目的减少集中在服务业。但是,过去五年里,所有发展中区域制造业的绿地项目数量都一直低于之前五年期的水平。这对于工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大幅下滑与其他跨境资本流动的趋势形成了反差。由于银行贷款和组合投资弥补了外国直接投资的下滑,总资本流量从国内生产总值的 5.6% 增至 6.9%。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略有增加,从国内生产总值的 4.0% 增至 4.8%。

外国直接投资仍是发展中经济体最大的外部资金来源。外国直接投资 占流入发展中经济体整体的资金总额的 39%,但在最不发达国家所占 比例不到四分之一,这一比例自 2012 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

国际生产的扩张速度放缓。国际生产方式和生产要素跨境交换的方式 正逐渐从有形转向无形。外国分公司的销售继续增长,但资产和员工 的增长速度较慢。这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吸引生产能力投资的前景造成 不利影响。

# 全球价值链增长 停滞不前

全球价值链的增长停滞不前。全球贸易中的外国附加值(即各国出口中包含的进口商品和服务)在经历了二十年的持续增长之后于2010-2012年达到峰值。贸发会议的全球价值链数据显示,2017年,外国附加值占贸易比重下降1个百分点,至30%。与上一个十年

相比,这个十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发展中国家,所有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增长都大幅下降。全球价值链减缓与外国直接投资的趋势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证实了外国直接投资趋势对全球贸易格局的影响。

全球 100 强和发展中经济体 100 强中的多国企业在实现性别更加平衡的董事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尽管它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平均而言,100 强董事会中 22% 的成员为女性,优于标准普尔指数公司平均水平和各国的平均水平。





政策措施

# 投资政策发展

许多国家继续开展旨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努力。 2017年,65个国家和经济体通过了至少126项投资政 策措施,其中84%的措施对投资者有利。这些措施放 开了对运输、能源和制造等若干部门的进入条件。还通 过简化行政手续、提供激励措施和设立新的经济特区促 进和便利投资。 最近,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外国投资采取了一种更加苛刻的立场。2017年的新投资限制或监管主要反映出对国家安全和对外国拥有本国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担忧。一些国家加强了对外国收购的审查,特别是对战略性资产和技术公司的收购。若干国家正在考虑收紧投资筛选程序。

+18 in 2017

国际投资协定总统 3322

投资条约的制订已经走到了转折点。2017年新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数(18项)为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有效终止的条约数第一次超过了新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数。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大型区域协定的谈判保持了强劲势头,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

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诉求的数量依然很高。2017年,至少新提出了65起基于条约的投资者与国家争端案件,使已知的这类案件总数达到855起。截至2017年底,根据案情裁决的案件中,投资者获胜的案件达到约60%。

国际投资协定的改革在各地区顺利进行。自2012年以来,已有150多个国家采取步骤,制订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新一代国际投资协定。例如,一些国家根据贸发会议的国际投资制度一揽子改革方案对各自的条约网络进行了审查,并修改了条约模式。

65 起 投资者与国家 争端解决新案件

各国还开始对现有的老一代条约进行现代化改造。例如,越来越多的 国家正在发布对旧协定的解释或予以更替。各国还开展了多边改革讨 论,包括关于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的讨论。

在改进新条约的谈判方法并将现有条约现代化之后,改革过程的最后一步(第三阶段)是确保国内投资政策与其他国际法的统一。努力实现统一未必意味着法律上的统一——不一致和差异之处可能是有意为之,但不同的政策领域和法律文书应协同工作。

### 投资与新工业政策

工业政策已经无处不在。贸发会议的全球工业政策调查显示,过去 10 年里,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至少有 101 个经济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逾 90%)通过了正式的工业发展战略。过去五年里,制订新战略的速度加快。

调查显示,现代工业政策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涉及新的主题,并包括了超越传统工业发展和

正式的工业 发展战略:



结构转型的诸多目标,例如全球价值链整合和升级、发展知识经济、建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联的部门以及为新工业革命进行竞争性 定位。

贸发会议的调查将工业政策分为三类:建设型、追赶型和基于新工业革命的战略。约40%的工业发展战略包含建立特定产业的纵向政策。略多于三分之一的战略侧重于加强竞争力的横向政策,旨在赶超至生产率前沿。还有四分之一注重为新工业革命进行定位。

约90%的现代工业政策规定了详细的投资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激励措施和业绩要求、经济特区、投资促进和便利,以及越来越多的投资筛选机制。三种模式的一揽子投资政策使用了类似的投资政策工具,但侧重点和力度不同。

所以说,现代工业政策是投资政策趋势的关键驱动因素。事实上,2010年以来出现的投资政策措施中超过80%针对的是工业体系(制造、补充服务和工业基础设施),而且其中约半数的措施明显是为一项工业政策目标服务的。大多数措施横跨多个产业,约10%的措施以具体的制造产业为目标。

激励措施仍然是工业政策最常使用的工具。在使激励措施成为促进工业发展的更有效工具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适用于制造业的激励计划约三分之二以多个或特定产业为目标,即便是横向激励计划也往往

侧重于研发等明确界定的活动,或是其他工业发展的促进因素。业绩要求(大多为激励措施所附的条件)也得到广泛使用,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多国企业对工业发展的贡献,但它们的许多功能可以通过改进设计和基于成本的激励机制实现。

经济特区继续增加和向多样化发展。在大多数国家,从 纯粹的出口加工区向增值区的转变仍在继续,并出现了 新的特区类型。旨在吸引特定产业和将多个特区连成一 体的有针对性的战略为一些已经实施建设型和追赶型工

# 一揽子 工业政策



战略和措施

业政策的国家的工业发展和全球价值链整合提供了支持,但飞地的风险依然存在。高科技园区或工业园区也成为以新工业革命为导向的工业政策的关键工具。

现代工业政策促进了投资便利化努力,直到最近,后者在投资政策框架中仍然发挥着次要作用。许多发展中国家将投资便利化作为工业发展战略的关键横向措施之一。有针对性的投资促进措施(除激励措施和经济特区之外)也依然重要:三分之二的投资促进机构在界定投资促进的优先部门时遵循的是工业政策,四分之二的机构有具体的促进计划来升级工业技术。

投资筛选程序日益常见。制造业很少受到直接的外资 所有权限制的影响,高度敏感的产业除外。但是,在 一些对工业发展具有重要性的基础设施行业和服务行 业,仍然普遍存在限制。过去十年里所实施的大多数 措施已经取消或者放宽了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但在 一些情况下,准入规则(或更确切地说准入程序)因 为新的筛选程序或要求而收紧。

总而言之,投资政策(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政策)是 工业政策的一项重要工具。不同的工业政策模式意味 着不同的投资政策组合。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投资对



发展工业能力的贡献,建设型、追赶型和以新工业革命为基础的工业 政策强调的投资政策工具不同,侧重的部门、经济活动和机制也不同。 因此投资政策工具包也随着工业政策模式和发展阶段不断变化。

现代工业政策,无论是建设型、追赶型还是新工业革命驱动型,往往都遵循若干设计标准,使它们有别于前几代的工业政策。其中包括开放性、可持续性、对新工业革命的准备程度和包容性。投资政策选择应遵循这些设计标准,以及政策一致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的需求。

根据这些进展,各国需要确保其投资政策工具与时俱进,包括为此调整投资激励措施,对经济特区进行现代化改造,重新调整投资促进和便利化,制订筛选投资的巧妙机制。新工业革命特别需要对促进工业发展的投资政策进行战略审查。

协同作用

为了使现代工业政策有助于可持续发展战略,决策者需要加强它们与国家和国际投资政策以及其他政策领域,包括社会和环境政策的一致性和协同作用。 他们需要在市场和国家的角色之间取得平衡,避免监管过度。他们还需要采取合作的方式,对国际生产能力合作持开放态度,避免以邻为壑的结果。

# 概述

# 全球趋势与前景

#### 201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大幅下滑

201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减少了 23%,从 2016年的 1.87 万亿美元降至 1.43 万亿美元(图 1)。这一下降与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等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形成鲜明反差,后两者在 2017年均出现了实质性改善。下降的部分原因是跨国并购净额减少了 22%。但即便不考虑导致 2016年外国直接投资激增的大型一次性交易和企业重组,2017年的降幅依然很大。作为未来趋势指标的已宣布绿地投资值也减少了 14%,降至 7,200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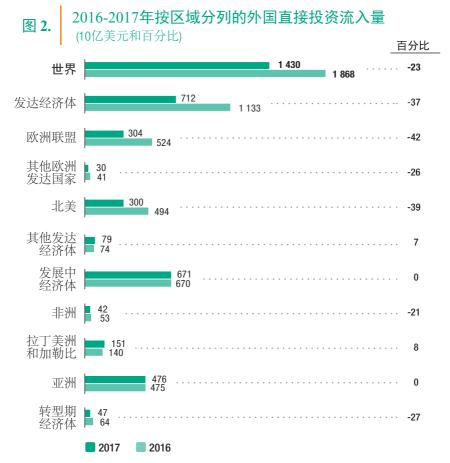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 / 多国企业数据库 (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 下降集中于发达经济体

发达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而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保持稳定。因此,2017年,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中所占份额有所增加,占总量的47%,而2016年为36%。

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降至7,120亿 美元(图2)。这一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前一年由于跨国并购 和公司重组导致的高流入量出现下降。这类交易的价值大幅下降,致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 / 多国企业数据库 (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使流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 40%,降至 2,750 亿美元,流入联合 王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 92%,降至 150 亿美元。由于美国多国企业 预期,汇回的资金将获得减税,受此激励再投资收益上升了 26%。

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仍接近2016年水平,为6,710亿美元,在经历了2016年10%的降幅之后没有出现复苏迹象。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继续下滑,流入亚洲发展中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保持稳定,而流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外国直接投资略有增加。

2017年流入东南欧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中的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27%,降至470亿美元,是2005年以来的第二低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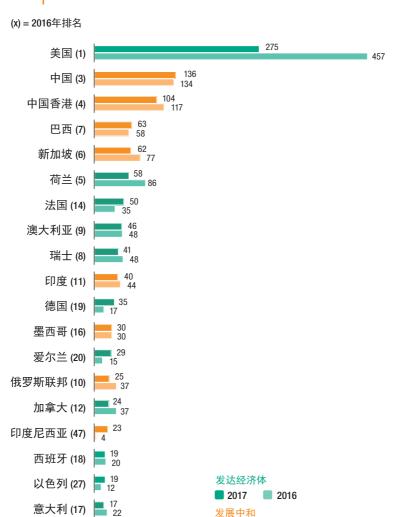
十大东道经济体中有一半是发展中经济体(图3)。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吸引了2,75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其次是中国,创下了1,360亿美元的纪录,尽管2017年上半年最初有所放缓。法国、德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排名大幅上升。

对外投资最多的仍然是发达经济体(图 4)。这些国家多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仅略有减少。2017年,发达经济体的对外投资流量减少了 3%,降至 1 万亿美元。它们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外向流动中所占份额保持不变,为 71%。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资金流量减少了 6%,降至 3,810亿美元,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针对 2015-2016 年期间大量资本外流实施了限制性政策,来自中国的资金流量 15 年来首次下降(降幅为 36%,降至 1,250 亿美元)。转型期经济体的流出量增加了 59%,达到 400 亿美元。

#### 所有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收益均出现下降

外国直接投资的负增长趋势由多重因素造成。轻资产形式的海外业务正导致外国直接投资模式发生结构性转变(见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过去五年外国直接投资收益率大幅下降。2017年,全球外国内向直接投资的收益率降至6.7%(表1)。尽管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平均收益率仍然较高,但大多数区域未

# 图 3. 2016年和2017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排名前20的东道经济体(10亿美元)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 / 多国企业数据库 (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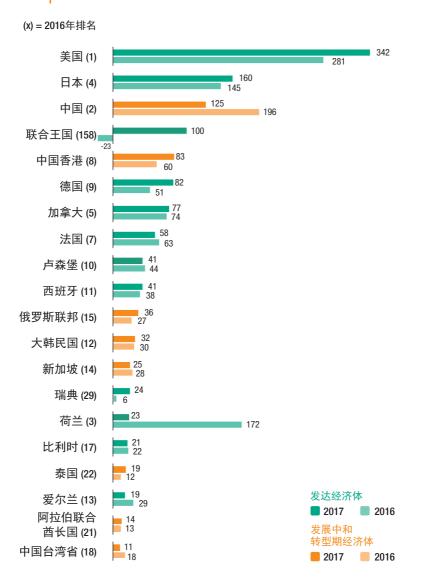
转型期经济体

2017

2016

大韩民国 (26) 17

# 图 4. 2016年和2017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排名前20的输出经济体(10亿美元)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 外国直接投资 / 多国企业数据库 (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表 1. 2012-2017年内向外国直接投资收益率 (百分比)								
区域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世界	8.1	7.8	7.9	6.8	7.0	6.7		
发达经济体	6.7	6.3	6.6	5.7	6.2	5.7		
发展中经济体	10.0	9.8	9.5	8.5	8.1	8.0		
非洲	12.3	12.4	10.6	7.1	5.4	6.3		
亚洲	10.5	10.8	10.6	9.9	9.5	9.1		
东亚和东南亚	11.5	11.8	11.7	11.0	10.3	10.1		
南亚	7.2	6.7	6.1	5.5	6.4	5.7		
西亚	5.5	5.4	4.9	4.6	4.6	3.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7.9	6.7	6.6	5.2	5.3	5.6		
转型期经济体	14.4	13.9	14.6	10.2	11.1	11.8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基于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数据库的计算。

能避免受挫。例如,在非洲,投资收益从 2012 年的 12.3% 降至 2017 年的 6.3%。由于依赖初级商品相关外国直接投资的地区下降特别严重,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这一时期初级商品价格的下降解释。但下滑的普遍性表明,结构性因素也在发挥作用,主要是国际业务中财政套利和劳动力成本套利的机会减少。

## 绿地项目减少,制造业陷入多年低迷

所有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都有所减少。初级、制造和服务部门的并购值均出现下降。宣布的绿地项目总额也下降了14%,至7,200亿美元。尽管2017年的下降集中于服务部门,而且在化学品和电子产品等部分制造行业投资项目活动有所增加,但从更长远来看,制造业宣布的绿地项目总额仍然相对低迷。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亚洲发展中地区,2013-2017年间制造业的投资项目活动一直低于前一个五年期的水平。这可能对于受外国直接投资支撑的工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 外国直接投资下滑影响了发展中济体最大的 资金来源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急剧下降与其他跨境资本流动的趋势形成反差。由于银行贷款和组合投资(主要是债务)流动弥补了外国直接投资的下滑,资本流动总额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5.6% 增至 6.9%。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本增幅较小,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0% 增加到 4.8%,因为相对而言这些国家更依赖外国直接投资。

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一系列外部资金来源,包括外国直接投资、组合投资、长期和短期贷款(私营和公共)、官方发展援助、汇款和其他官方流动。过去十年里,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是发展中经济体最主要的外部资金来源,也是最能抵御经济和金融冲击的来源。它占发展中经济体整体流入资金总额的39%,但在最不发达国家仅占四分之一不到。此外,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呈现下降趋势,2017年减少了17%,这是连续第二年出现下降。

#### 国际生产和全球价值链增长正在放缓

国际生产仍在增长,但速度正在减缓,跨界交易以及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交换的方式正在转变(表2)。过去五年,外国分公司销售额(1.5%)、增加值(1.5%)和就业(2.5%)的年均增长率均低于2010年前的同期水平(分别为9.7%、10.7%和7.6%)。这与外国直接投资长期趋势中增长势头的丧失是一致的。

外国分公司的销售增长速度是资产和员工增长速度的两倍,延续了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描述的轻资产国际生产趋势。与商品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仅增长不到1%)相比,过去五年收到的特许权使用费和许可证费的年均增长率(近5%)表明,国际生产正从有形的跨境生产网络转向无形的价值链。这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吸引生产能力投资的前景产生不利影响。

全球价值链的增长也停滞不前。贸易中的外国附加值(即一国出口中包含的进口商品和服务,是衡量全球价值链重要性的重要指标)经过

# 

	现行价格值 (10亿美元)									
项目	1990	2005-2007 (危机前平均值)	2015	2016	2017					
外国直接投资 流入量	205	1,415	1,921	1,868	1,430					
外国直接投资 流出量	244	1,452	1,622	1,473	1,430					
内向外国直接 投资存量	2,196	14,487	25,665	27,663	31,524					
外向外国直接 投资存量	2,255	15,188	25,514	26,826	30,838					
内向外国直接 投资收入	82	1,027	1,461	1,564	1,581					
内向外国直接 投资收益率	5.4	9.2	6.8	7.0	6.7					
外向外国直接 投资收入	128	1,101	1,394	1,387	1,553					
外向外国直接 投资收益率	7.8	9.5	6.1	5.8	6.2					
跨境并购	98	729	735	887	694					
外国分公司 销售额	6,755	24,217	27,559	29,057	30,823					
外国分公司 增加值(产品)	1,264	5,264	6,457	6,950	7,317					
外国分公司 总资产	5,871	54 791	94,781	98,758	103,429					
外国分公司的 就业(千人)	27,034	57,392	69,683	71,157	73,209					
备注										
国内生产总值	23,433	52,383	74,407	75,463	79,841					
固定资本形成 总值	5,812	12,426	18,561	18,616	19,764					
专利和许可证 收费	31	174	299	312	333					
商品和服务出口	4,414	14,957	20,953	20,555	22,558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

二十年的持续增长,似乎于 2010-2012 年达到了顶峰。贸发会议的全球价值链数据显示,2017 年外国附加值在贸易中的比重下降了 1 个百分点,降至 30%。与上一个十年相比,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所有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增长率都大幅下降 (图 5)。这种放缓与外国直接投资趋势显示出明显的相关性,证实了外国直接投资对全球贸易格局的影响。

### 顶尖多国企业领先实现性别更加平衡的董事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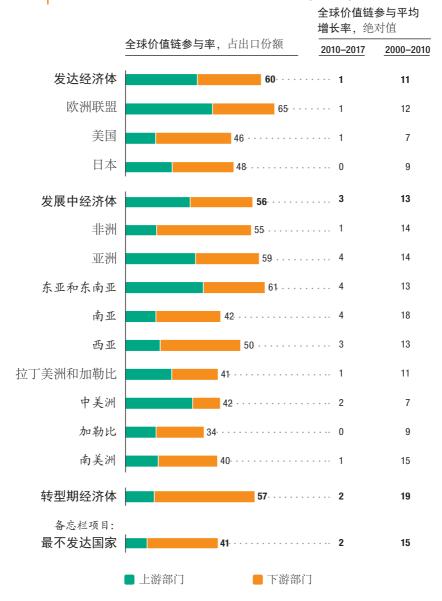
全球 100 强和发展中经济体 100 强中的多国企业在实现性别更加平衡的董事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尽管它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截至 2017 年底,多国企业 100 强的董事会席位中,女性占 22%,有五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为女性。董事会的代表率略优于标准普尔 500 指数公司的平均水平,与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占优势。

董事会成员最多样的多国企业是欧洲的企业,因为欧洲一些国家制定了配额和目标,其次是北美的企业,这里对女性的任命不受管制。 发展中经济体中,南非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女性占相当的比例。 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公司以及日本公司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和南非的同行。

### 外国直接投资前景: 增长乏力

前景依然暗淡;对 2018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预测显示增长乏力。预计全球流量将略有增长,最多可达 10%,但仍将低于过去 10 年的平均水平。通常,对经济增长、贸易额和商品价格较高的预测意味着 2018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出现较大的增幅。但是,风险显著,政策不确定性大量存在。贸易紧张局势的升级和扩大可能对全球价值链的投资产生不利影响。此外,美国的税务改革和税率竞争的加剧可能对全球投资模式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宏观经济变数的较长期预测包含重要的不利因素,包括发达经济体加息的前景,可能对新兴市场的货币和经济稳定造成严重影响。

图 5. 2017年按区域分列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 2010-2017年及2000-2010年的增长率(百分比)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 基于贸发会议 EORA 全球价值链数据库的数据。

## 区域趋势

### 非洲外国直接投资创下10年新低

2017年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降至 420 亿美元,比 2016年减少 21%。油价疲软和初级商品泡沫破裂的持续有害影响导致资金流收缩,尤其是在初级商品出口大国。流入埃塞俄比亚和摩洛哥等多样化出口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显示出较强的韧性。

流入北非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 4%,降至 130 亿美元。对埃及的投资减少,但该国仍然是非洲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对摩洛哥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 23%,达到 27 亿美元,其中包括对汽车部门的大规模投资。流入中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 22%,至 57 亿美元。由于尼日利亚经济依然低迷,对西非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 11%,至 113 亿美元。对尼日利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 21%,至 35 亿美元。非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东非 2017 年获得 76 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比 2016 年减少 3%。埃塞俄比亚吸收了其中近一半的资金,达 36 亿美元(减少 10%),目前是非洲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第二多的国家。由于国内需求强劲和流入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的投资,对肯尼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增至 6.72 亿美元,增加了 71%。在南部非洲,外国直接投资减少 66%,至 38 亿美元。由于初级商品部门表现不佳和政治不确定性,对南非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 41%,至 13 亿美元。相比之下,由于对铜矿投资的增加,流入赞比亚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增加。

初级商品价格开始回升,再加上《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签署 促进了区域间合作,只要全球政策环境继续提供支持,就可能刺激 2018年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增加。

## 流入亚洲发展中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保持稳定

2017年流入亚洲发展中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保持在2016年的水平(4,760亿美元)。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强劲投资,以及对大多数东盟国家投资的增加,足以抵消该地区其他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接受经济体出现的下降,依次包括香港(中国)、新加坡、印度和沙特阿拉伯。该地区重新成为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区域,其在全球流入量中所占比例从2016年的25%上升至2017年的33%。

对东亚的外国直接投资稳定在 2,650 亿美元,流入香港(中国)的外资减少,但流入中国的外资创下历史新高。在东南亚,流入东盟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 11%,达到 1,340 亿美元,这是由于流入大多数成员国的投资都有所增加,流入印度尼西亚投资也出现强劲反弹。流入南亚的资金减少了 4%,至 520 亿美元,主要由于流入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流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继续呈下降趋势(降至 260 亿美元),自 2008 年以来流入该区域的投资几乎一直呈现下降。

由于 2003 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出现逆转,2017 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减少9%,降至3,500 亿美元。尽管有所下降,但该地区仍然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仍占全球外向流量的近四分之一。

2018年,流入该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量预计将保持在类似水平。由于中国最近宣布了促进和吸引外国投资的计划,流入该国的投资可能出现持续增长。其他增长来源可能包括更多的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包括对该区域相对低收入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对 CLMV 国家 (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和越南)的投资。在西亚,油价的演变、石油资源丰富国家促进经济多样化的努力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将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外国直接投资略有增加

2017年,流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8%,达到1,510亿美元。这是六年来的首次增长,尽管流入量仍远低于2011年初级商品繁荣时期的峰值。随着拉美多国企业恢复国际投资活动,2017年该地区的对外投资反弹86%,达到173亿美元。

随着阿根廷和巴西两大经济体的衰退结束,对南美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10%。在投资大量流入能源部门的支持下,对巴西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8%,达到630亿美元。在阿根廷,随着经济复苏以及实施吸引投资和升级基础设施的新政策,流入的投资增加了两倍多,达到120亿美元。在年底油价回升、基础设施投资和内需增长的支持下,对哥伦比亚的投资增加了5%,达到145亿美元。对中美洲的投资略

有增长,达到 420 亿美元。尽管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但流入墨西哥的投资仍稳定在 300 亿美元,这得益于对汽车工业创纪录的高投资。对加勒比次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到 50 亿美元,推动这种增长的是流入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投资,由于对贸易活动投资的蓬勃发展以及对电信和能源工业的净投资流入,对该国的投资增加了 48%,达到 36 亿美元。

流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投资预计将保持停滞或小幅下降,维持在1,400亿美元左右。由于面临许多下行风险的挑战,包括一些最大经济体即将举行的选举带来的经济和政策不确定性,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该区域的经济增长预计将保持温和。

## 流入转型期经济体的投资大幅减少

流入东南欧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的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27%,降至470亿美元,为2005年以来的第二低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流入四个主要接受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乌克兰)的外国直接投资缓慢。相比之下,由于大量的绿地投资和总部设在俄罗斯联邦的多国企业的几次大规模收购,流出额反弹了59%,达到400亿美元。

流入东南欧的外国直接投资在经历了 2016 年的下降之后,恢复了 20%,达到 55 亿美元。强劲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支持私营部门创造就业机会以及与欧盟日益加强的合作,提振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在该次区域最大的经济体塞尔维亚,外国投资增加了 22%,达到 29 亿美元,主要是对现有外国分公司的再投资。流入独联体和格鲁吉亚的资金在 2016 年经历反弹后收缩了 31%,降至 410 亿美元。政策不确定性仍然很高,部分原因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关切。结果造成流入量减少,特别是流入俄罗斯联邦的投资(减少 32%,至 253 亿美元)。自然资源仍然主导流入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受到初级商品价格上涨和宏观经济增长加快的支撑,2018年的前景是温和乐观的。中期而言,已宣布绿地项目的稳固性和结构多样化可能促进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

### 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三分之一

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 37%, 至 7,120 亿美元。2015-2016 年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年度流入量超过 1 万亿美元,现在突然停止增长。流入联合王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在 2016 年出现异常高的并购价值之后大幅减少,而流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也由于美国当局对税负倒置严加控制而大幅减少,这是导致这种降幅的主要因素。发达经济体的投资流出量与 2016 年持平。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增长抵消了欧洲的总体下降,美国的增长归因于收益再投资,而日本多国企业继续寻求海外增长。

流入法国和德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于 2017 年出现反弹,但由于对联合 王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正常化,流入欧洲的总量有所减少。在北美,公 司内部贷款的减少和资产剥离导致流入的投资减少。流入亚太地区的 投资则与全球趋势相反,保持稳定。

在欧洲,流出总量减少了 21%,降至 4,180 亿美元。德国和联合王国的投资流出量大幅增加。法国的流出量也保持了较高水平。2016 年欧洲最大的投资来源国荷兰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减少了 1,490 亿美元,仅为 230 亿美元,主要是因为并购交易减少。北美流出量增加了 18%。随着 2017 年底税制改革的前景变得更加明朗,美国多国企业推迟了海外收益的汇回,致使再投资增加。在亚太地区,日本的投资流出量继续增加,达到 1,600 亿美元。

2018年,对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预计将适度增加。已宣布的绿地项目价值上升(增加25%,至3,180亿美元)是一个积极迹象。然而,当前全球贸易决策的紧张局势造成了不确定性。美国多国企业因税制改革而汇回的累积利润,可能会减少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并在其他地方产生镜像效应。

### 流入结构薄弱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仍然不足

流入最不发达国家整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减少了17%,降至260亿美元,相当于流入所有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的4%。尽管流

入亚洲最不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强劲,非洲三分之二的最不 发达国家吸引了比前一年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但安哥拉和莫桑 比克的收缩非常严重。

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可望因对非洲外国直接投资的预期增加而复苏。然而,2017年宣布的外国直接投资绿地项目价值——未来投资活动的一项关键指标——跌至四年低点。主要来自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投资者缩减了资本支出计划,特别是针对孟加拉国、柬埔寨和缅甸的服务业投资。这削弱了对亚洲最不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前景。

2017年,流入32个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3%,达到230亿美元。尽管出现了这一小幅增长,但流入内陆发展中国家的总量仍比2011年的峰值低近40%。除转型期经济体外,所有按区域分列的内陆发展中国家分组都取得了增长。

流入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在 2018 年进一步恢复,但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依然存在。作为未来项目主要指标的已宣布绿地项目的价值在 2017 年出现下降。流入大多数内陆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仍然容易受到不利外部因素的影响,它们的投资潜力与进出口过境的邻国的发展情况密切相关。

流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量连续第二年出现增长,达到 41 亿美元,引领这种增长的是加勒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流入量增加 了 9%。流入其他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缩减。

流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将维持乏力状态。2016-2017 年宣布的绿地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总量停滞不前,凸显了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吸引和维持外国直接投资的持续挑战。服务业将继续占主导地位, 但流入该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正在减缓。鉴于已宣布的项目和公私伙 伴关系在基础设施开发方面的高度集中,预计短期内只有少数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会出现增加。

## 投资政策趋势

#### 对外国收购的审查收紧

新的国家投资政策措施继续以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促进为导向。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2017年,65个国家和经济体至少通过了126项影响外国投资的投资政策措施,是过去十年里国家数目和政策变化数量最多的一次。在这些措施中,有93项涉及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促进,18项引入了限制或监管措施(其余15项措施属于中性)。因此自由化和促进占投资政策变化的84%(图6)

若干行业放松了对外国投资的准入限制,包括运输、能源和制造部门, 其中亚洲的发展中经济体最为活跃。许多国家通过简化行政手续、提 供激励措施和设立新的经济特区来鼓励投资。而新的投资限制和监 管则主要反映了对国家安全以及对外资拥有本国土地和自然资源的 担忧。

图 6. 2003-2017年国家投资政策变化 (百分比)



尽管 2017 年的总体趋势趋向于自由化或促进措施,但最近几个月,限制或监管性投资政策措施所占比例大幅增加。从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4 月,新出台的投资措施中有 30% 为限制性或监管性措施。一些国家对外国收购采取了更为严苛的立场,特别是当这些收购涉及国家安全事务或涉及出售战略性国有资产和技术公司时。此外,若干国家正在讨论进一步加强外国投资筛选机制的备选方法。

## 投资条约的制订走到了转折点

2017年新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数为 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各国共缔结了 18 项新的国际投资协定,其中 9 项为双边投资条约,9 项为含投资条款的条约。最活跃的经济体是土耳其,缔结了四项条约,其次是缔结了两项条约的中国香港。2018年 1 月至 3 月间,又签署了三项国际投资协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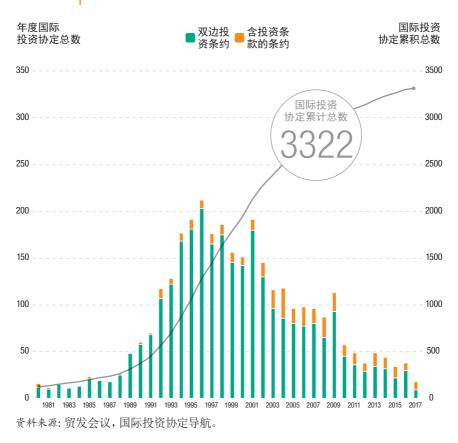
此外,有效终止条约的数目 (22 项) 首次超过新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数 (18 项)。印度和厄瓜多尔在终止条约方面特别活跃。国际投资协定总数由此达到 3,322 项 (2,946 项双边投资条约和 376 项含投资条款的条约),其中在 2017 年底有效的条约为 2,638 项 (图 7)

大型区域协定的谈判保持了强劲势头,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欧盟继续与日本等国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关于投资的章节的重新谈判已经开始。此外,一些国家集团正在制定不具约束力的投资决策指导原则。

### 基于条约的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新案件数量高居不下

2017年,至少发起了65起基于条约的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新案件,使已知案例总数达到855起(图8)。迄今为止,113个国家已对一项或多项已知的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诉求作出答复。2017年,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法庭就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做出了至少62项实质性裁决。在根据案情裁决的已知案件总数中,投资者获胜的案件约占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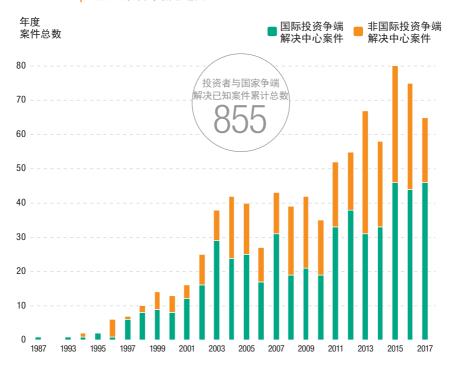
图 7. 1980-2017年签署国际投资协定的趋势



## 国际投资协定改革在各地区顺利进行

自 2012 年以来,已有 150 多个国家采取步骤,制定新一代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国际投资协定(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第一阶段)。例如,它们根据贸发会议的国际投资制度改革一揽子方案,审查了各自的条约网络并修订了条约模式。与千年之交缔结的条约形成鲜明反差的是,2017 年缔结的所有条约都至少包含六项"改革特征",而且 2010 年前国际投资协定中被视为创新的一些条款现在经常出现(表 3)。现代条约制订中的突出要点包括可持续发展导向、保护监管空间和改进(或省略)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

图 8. 1987-2017年基于条约的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已知案件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 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导航。

各国还在对现有的老一代条约进行现代化(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第二阶段)。例如,为数不多但不断增加的国家正在发布对老一代协定的解读或予以更替。各国还在进行多边改革讨论,包括关于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的讨论。目前第一代条约的数量超过3,000项(约占国际投资协定总数的90%),为改革行动提供了更多机会。

## 在改革新旧条约之后的下一步

在改进新条约的谈判方法并将现有条约现代化之后,改革过程的最后一步(第三阶段)是确保国内投资政策与其他国际法的统一。

#### 一般例外,例如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或为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 每项条款的承诺范围和力度视国际投资协定而各异 约旦一沙特阿拉伯双边投资协定 关于加强经济关系的太平洋协定补充条款 卢旺达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双边投资协定 土耳其一乌兹别克斯坦双边投资协定 一智利自由贸易协定 一中国香港投资协定 布隆迪一土耳其双边投资协定 双边投资协定 南方共同市场内部投资便利化协议 以色列一日本双边投资协定 莫桑比克一土耳其双边投资协定 土耳其一乌克兰双边投资协定 中国一中国香港投资协议 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际投资协定中的改革导向条款 阿根廷-**东盟**· 哥伦比亚 2017年 不适用 2000年和2017年缔结的国 旡 奥地利一孟加拉国 双边投资协定 日俄罗斯一新加坡 双边投资协定 古巴一巴拉圭 双边投资协定 整尔比亚一土耳其 双边投资协定 希腊一墨西哥 蒙古一菲律宾 双边投资协定 尼日利亚一瑞士 双边投资协定 国际投资协定的洗定内容 、民民主共和国 双边投资协定 卢旺达一南非 双边投资协定 意大利一利比亚 双边投资协定 马来西亚一沙特阿拉伯 双边投资协定 文莱达鲁萨兰国一中国 双边投答协定 智利一多米尼加共和国 双边投资协定 双边投资协定 一步村人 赤3. 2000年 印度

- 条约序言中提到保护健康和安全、劳工权利、环境或可持续发展
- 对投资的明确定义(如提到投资的特点; 排除组合投资、主权债务或对纯粹源自商业合 同的资金的索取权)
- 等同于习惯国际法下有关外国人待遇的最低标 限定公平和公正待遇(参照习惯国际法),
  - 澄清哪些行为构成间接征用,哪些行为不构成间接征用 准,或用国家义务清单加以澄清

限制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准入(例如,限制诉诸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的条约条

从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条款中排除若干政策领域,或者限制提交申请期限,

关于投资促进和(或)便利化的具体积极规定

去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

9 Ξ

推广公司和社会

通过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纳入单独的条款或在条约序言中宽泛提及, 明确承认缔约方不应为吸引投资放松卫生、安全或环境标准

任标准

ω

- 自由转移资金义务的详细例外,包括国际收支困难和(或)国内法的执行
- 条款 遗漏所谓的"伞式"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

由于许多国家的国内投资法律框架涵盖了与国际投资协定相同的体制、待遇和保护问题,因此,要有效改革国际投资协定,可能需要在国内法律中采取平行步骤。反过来,国家政策框架也可能推动国际投资协定的改革(例如在投资便利化、投资者义务和争端解决方面)。各国可以通过加强国家和国际投资决策者之间的合作以及澄清两种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确定一种制度优先于另一种制度)来改善两者的协同作用。

还可以开展更多工作来改善国际投资协定与其他国际法和政策之间的一致性。具体的改革步骤可以减轻与监管空间受限和争端解决有关的风险,还可以降低行政程序对国家和投资者而言的复杂程度。例如,国际投资协定谈判者可以纳入其他决策领域的例外,使用交叉对照并为法庭对条约条款的解释提供指导。

努力实现统一未必意味着法律上的统一——不一致和差异之处可能是有意为之。因此,需要对不同制度之间的结构和背景差异具备充分的了解才能决定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在缺乏多边投资框架的情况下,全面的制度改革将得益于支持的加强。作为联合国内促进国际投资的协调中心,贸发会议可以通过其三大工作支柱——研究和政策分析、技术援助和建立政府间共识——发挥关键作用。2018年10月贸发会议在世界投资论坛期间举行的高级别国际投资协定会议将成为这方面的一个里程碑。

## 金融市场日益促进对可持续发展的投资

旨在促进对可持续企业的投资和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本市场政策和工具,是投资领域日益重要的特点。资本市场在投资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条投资链最终为多国企业及其国际活动提供了资金。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市场创新继续吸引着组合投资者的兴趣,而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产品的良好记录则强化了资产管理人的观点,即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对长期投资业绩至关重要。随着这些可持续投资趋势扎根并壮大,它们可能对上市多国企业与其股东之间的关系产生更大的影响,进而影响多国企业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经营政策和做法。

21

以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为重点对全世界证券交易所相关工具进行的研究显示,有54家证券交易所至少具备一项促进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实践的机制(图9)。约40家证券交易所提供可持续性指数,39家交易所提供环境、社会和治理相关培训。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全世界有38家证券交易所提供关于环境、社会和治理披露的自愿指导(多于2017年第一季度末的32家),14家交易所将环境、社会和治理披露作为强制性规则(多于前一年的12家)。联合国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目前包括72家交易所(多于2017年第一季度末的63家);在这些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共计45,000多家,市值超过80万亿美元。

图 9. 证券交易所使用的可持续机制概览 (交易所数量)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 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数据库。

# 投资与新工业政策

### 工业政策无处不在

贸发会议的全球工业政策调查显示,仅在过去10年里,至少有101 个经济体——包括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的 90% 以上——通过了正式的工业发展战略。过去 5 年来,制定新战 略的速度加快。

现代工业政策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涉及新的主题、包括超越传统工 业发展和结构转型的无数目标。其中包括整合和升级全球价值链、发 展知识经济、建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联的部门以及为新工业革命 讲行竞争性定位。

投资政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一直是工业政策 的重要工具。不同的工业政策模式具有不同的投资政策组合。投资政 策需要体现现代工业政策的新主题。新工业革命尤其要求对投资政策 讲行战略审查,以促进工业发展。

#### 现代工业—揽子政策日益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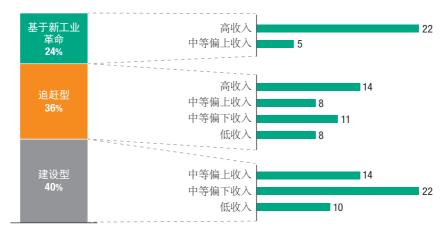
对最近典型工业政策的最佳解读是,这是一揽子互动战略和措施,旨 在:(一)建设扶持性工业系统(基础设施、金融系统)和生产能力(包 括资产、技术和技能);(二)支持国内和出口市场的发展。这些目标 需要在公司、行业和跨行业层面采取行动。每个组成部分都具备投资 政策要素。

贸发会议的调查显示,最近通过的工业发展战略中,约有40%包含 建设特定产业的纵向政策(图10)。略多于三分之一的战略重点是横 向竞争力,加强旨在赶超至生产率前沿的政策。还有四分之一的战略 重点是为新工业革命进行定位。

建设型、追赶型和基于新工业革命的战略都是工业政策的现代形式, 适合发展相继经历的不同阶段。它们不是相互分立的模式,所有的建

23

#### 图 10. 近期的工业政策模式 占样品比例(百分比)以及按国家分组的战略数量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

设型政策都包含提高竞争力的横向措施,追赶型模式促进创新和采纳新技术,基于新工业革命的模式为新产业使用建设机制。

约90%的工业政策规定了详细的投资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财政激励措施和经济特区、业绩要求、投资促进和便利化以及越来越多的投资筛选机制(表4)。三种模式的一揽子投资政策使用了类似的工具,但侧重点和力度不同。

## 工业政策是投资政策实践的关键驱动因素

2010年以来出现的投资政策措施中超过80%针对的是工业体系(制造、补充服务和工业基础设施),而且其中约半数的措施明显是为某一项工业政策目标服务的。大多数措施横跨多个产业,约10%的措施以具体的制造产业为目标。与工业政策模式一致,最常见的措施涉及激励措施和业绩要求、经济特区、投资便利化和投资者定位,以及投资筛选程序。

表 4.

#### 工业发展战略中的投资政策,按类型分列 (占样品的百分比)

准入和规定

工业政策 模式	激励 措施	特区/ 孵化器	投资 便利化	自由化	限制	业绩要求
建设型	87	85	85	20	7	30
追赶型	93	76	88	17	2	5
基于新工业 革命	100	74	48	4	0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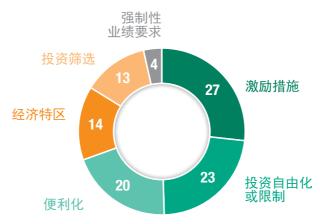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

激励措施仍然是工业政策最常使用的工具(图 11)。在使激励措施成为促进工业发展的更有效工具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约三分之二的适用于制造业的激励计划以多个或特定产业为目标,即便是横向激励计划也往往侧重于研发等明确界定的活动,或是其他工业发展的促进因素。业绩要求(大多为激励措施所附的条件)也得到广泛使用,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多国企业对工业发展的贡献,但它们的许多功能可以通过改进设计和基于成本的激励机制实现。

经济特区继续增加并出现多样化。在大多数国家,从纯粹的出口加工 区向增值区的转变仍在继续,并出现了新的特区类型。旨在吸引特定 产业和将多个特区连成一体的有针对性的战略为一些已经实施建设型 和追赶型工业政策的国家的工业发展和全球价值链整合提供了支持, 但飞地的风险依然存在。高科技园区或工业园区也成为以新工业革命 为导向的工业政策的关键工具。

现代工业政策推动了投资便利化,直到最近投资便利化在投资政策框架中一直发挥着次要作用。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将投资便利化作为工业发展战略的关键横向措施之一。有针对性的投资促进措施(除激励措施和经济特区之外)也依然重要:三分之二的投资促进机构在定义投资促进的优先部门时遵循的是工业政策,四分之二的机构有具体的促进计划来升级工业技术。

#### 图 **11.** 2010-2017年以工业政策为目的的投资政策措施, 按类型分列(占总数的百分比, n = 387)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

制造业很少受到直接限制外国所有权的影响。然而,一些与工业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行业仍然普遍受到限制。但是,在一些对工业发展具有重要性的基础设施行业和服务行业,仍然普遍存在限制。过去十年里所实施的大多数措施已经取消或者放宽了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但在一些情况下,包括在发达国家,由于采取了以新工业革命为导向的工业政策模式,准入规则(或更确切地说准入程序)因为新的筛选程序或要求而收紧。

国际投资协定既可以支持也可以约束工业政策。它们可以通过保护投资和放宽规则来促进投资,但也可以通过排除使用某些限制或业绩要求来限制政策空间。为减轻国际投资协定的约束作用,存在一些灵活机制。

## 投资政策需要随着工业政策演变

随着工业政策不断增加并成为发展战略的主流,今日的决策者正日益面临一个重要挑战:新工业政策需要更有效地利用投资政策工具,而投资政策则需要按照新的工业发展战略实现现代化。

# 贸发会议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以及 工业政策与投资政策间的相互作用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

现代工业政策, 无论是建设型、追赶型还是新工业革命驱动型, 往往 都遵循若干设计标准。其中包括开放性、可持续性、对新工业革命的 准备程度和包容性。投资政策选择应遵循这些设计标准,以及政策一 致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的需求(图12)。

政策实践显示了建设型、追赶型和基于新工业革命的工业政策如何强 调不同的投资政策工具,并侧重于不同的部门、经济活动和机制,以 最大限度地发挥投资对发展工业能力的贡献。投资政策工具包随着工 业政策模式和发展阶段不断变化。

27

各国需要确保其投资政策工具与时俱进,包括为此调整投资激励措施,对经济特区进行现代化,重新调整投资促进和便利化,制订明智的外国投资筛选和监测机制。新工业革命特别需要对促进工业发展的投资政策进行战略审查。

为了使现代工业政策有助于可持续发展战略,决策者需要加强这些政策与国家和国际投资政策以及其他政策领域,包括社会和环境政策的一致性和协同作用。他们需要采取"整体政府"的方式,创造协同效应。他们还需要在市场和国家的角色之间取得平衡,避免监管过度。最后,他们需要采取合作的方式,对国际生产能力合作持开放态度,避免以邻为壑的结果。

# 历年的世界投资报告

WIR 2017: Investmen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WIR 2016: Investor Nationality: Policy Challenges

WIR 2015: Reform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Governance

WIR 2014: Investing in the SDGs: An Action Plan

WIR 2013: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WIR 2012: Towards a New Generation of Investment Policies

WIR 2011: Non-Equity Mode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WIR 2010: Investing in a Low-carbon Economy

WIR 2009: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WIR 2008: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Infrastructure Challenge

WIR 2007: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Development

WIR 2006: 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WIR 2005: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D

WIR 2004: The Shift Towards Services

WIR 2003: FDI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WIR 2002: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WIR 2001: Promoting Linkages

WIR 2000: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Development WIR 1999: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Challenge of Development

WIR 1998: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WIR 1997: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Market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Policy

WIR 1996: Investment,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Arrangements

WIR 1995: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Competitiveness

WIR 1994: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Employment and the Workplace

WIR 1993: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Integrated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WIR 1992: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s Engines of Growth

WIR 1991: The Triad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贸发会议关于投资和企业的若干方案

####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worldinvestmentreport.org

#### **World Investment Forum**

unctad-worldinvestmentforum.org

# UNCTAD Investment Policy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ipfsd

#### **UNCTAD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Framework**

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iaeed2012d1 en.pdf

#### **Sustainable Stock Exchanges Initiative**

sseinitiative.org

#### **Business Facilitation**

businessfacilitation.org

#### **Business Schools for Impact**

business-schools-for-impact.org

#### **Investment Policy Hub**

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

#### **FDI Statistics**

unctad.org/fdistatistics

#### **Investment Trends and Policies Monitors**

unctad.org/diae

####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unctad.org/iia

#### **Investment Policy Reviews**

unctad.org/ipr

#### **ISAR Corporate Transparency Accounting**

unctad.org/isar

####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Journal**

unctad.org/tnc



worldinvestmentreport.org

#### 如何获得出版物

出售的出版物可在世界各地通过联合国出版物的经销商购买。也可通过邮购获得: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Customer Service c/o National Book Network 15200 NBN Way PO Box 190 Blue Ridge Summit, PA 17214

email: unpublications@nbnbooks.com

unp.un.org

欲索取有关外国直接投资和多国企业工作的进一步信息,可致函:

Division on Investment and Enterpris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Palais des Nations, Room E-10052 CH-1211 Geneva 10 Switzerland

Telephone: +41 22 917 4533 Fax: +41 22 917 0498 unctad.org/diae

